

钓鱼台 档案

红旗出版社

第4卷



钓鱼台 档案

钓鱼台
档案



钓鱼台档案

《钓鱼台档案》编写组

• 第四卷 •

红旗出版社

第二节 迷雾消散狼真来 中韩建交混喜愁

韩国官员说：“这和去年的谎言如出一辙。”言下之意，这是台北又一次狂呼：“狼来了！”迷雾消散，“狼”果然来了，汉城的“阿里郎”要到北京来了。中韩建交其实早已发出了闪烁信号。台北惶惑了，流泪了。无论道路多么坎坷，无论别人怎么评说，中韩建交无疑有助于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

台北惊：狼又来了！

1992年8月19日，世界各主要通讯社自台北报道，台湾当局“外交部长”钱复对“立法院”吹风说，大陆政权已与南韩当局在最近签署了建交协议，并且将在不久的将来公开这一消息。

记者们立刻行动起来，找寻有关各方求证。

韩国驻北京代表机构的官员当即在电话里说：“什么也没有签订。”并说：“这和去年的谎言如出一辙。”言下之意，这是台北又一次狂呼：狼来了！

中国有关官员却遍寻不见！

8月20日，韩国外务部正式表态，中韩建交谈判已取得进展，但并没有签订秘密协议，并通告韩国外长李相玉和中国外长钱其琛将在9月10日至11日在曼谷会晤时讨论关系正常化问题。

在台北，“立法委员”们已在评说所谓中韩秘密协议的细节了。

某些“朝鲜问题观察家”认为，台湾此举“可能故意要使韩国与中国迟迟不得建交。它的手法是告诫北朝鲜，然后让它去对北京施加压力。”

而在北京，中国外交仍然耐人寻味地不置一词。

“狼”来了吗？

“阿里郎”弃台北来北京

狼果真来了，“阿里郎”要来北京。

8月21日，汉城电台广播说：韩国外务部官员宣布，韩中24日将正式建交，两国外长24日将在北京签署建交协定，并承认建交所有文件已经确定，同时宣布，卢泰愚将在两国建交后不久访问中国。

同日，韩国国家通讯社“联合通讯社”还报道说，一起偷窃中国驻汉城贸易代表处文件和数百美元的盗窃案使宣布建交决定推迟了将近3个星期，而台湾驻汉城“大使馆”涉嫌此案。

迷雾消散，“狼”果然来了；汉城的“阿里郎”要到北京来了。

台北哭了

尽管早知这是大势所趋，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可一旦中韩建交成为事实，台湾当局仍然无法接受，气恨难平。

8月20日，在台北。大约20名愤怒的抗议者高呼“韩国人，滚出去”的口号，在韩国大使馆前静坐示威，并烧毁了一面韩国国旗。

8月22日，在台北。被台湾新闻媒介戏称为“付钱外长”的钱复还未来得及抹去在尼日尔推行付钱外交得手的得意之色，就不得不气狠狠地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自韩国与中国建交之日起，台即与韩国断交；拒绝韩国特使团9月初来台解释断交理由；自即日起取消对韩贸易一切优惠待遇；在台韩新关系构架未成立之前，自9月15日起，双方民航协定停止实施……

8月24日下午，在汉城。台驻韩“大使馆”举行降旗礼。3点30分，台驻韩“大使”金树基夫妇神色沉痛，缓步走下使馆办公大楼台阶。

……

也难怪国民党人如此伤心。毕竟，与韩国有着44年的友好“邦交”历史，自30年代李承晚在上海成立韩国流亡政府起，国民党人一直积极支持韩国独立。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曾为此据理向美英首脑力争。1948年11月，大韩民国成立之后，两国利害相关，立场一致，曾互为“最亲密的反共战友”。然而形势比人强，随着世事变迁，只好随着时代的潮流分道扬镳了。

时代的潮流

中韩建交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广交各国朋友的需要与韩国卢泰愚总统所推行的“北方外交”政策相碰撞、相契合的结果。

所谓“北方外交”，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从莫斯科经由北京到达平壤”。意图是通过与朝鲜的两大北方盟国前苏联和中国建立关系，从而改变朝鲜半岛的冷战格局，进而实现朝鲜半岛南北统一。

1991年9月，前苏联与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次中韩建交，使韩国“北方外交”向前跨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大步。

世界舆论指出，实际上，在两国建交之前，双方的经济联系已十分密切。当时中国大陆是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韩国商务部估计，到1992年底，中韩的贸易额将达到100亿美元。

韩国已经在中国大陆建立了 500 家合资企业,无疑,中韩建交将带来两国经济关系的飞速发展。

国际舆论还认为,在国际政治力量消长方面,中韩建交将加强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近年来,日本以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在世界和亚洲地区的影响持续扩大。中韩建交后,两国加强合作,必然会加强各自在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地区的影响,这样,日本对中国经济和对韩国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就会有所克制。

闪烁的信号

中韩要建交,其实早已发出了闪烁信号。

1991 年 4 月份,韩国外长以出席国际会议的名义来到北京,受到中国总理李鹏接见。据外电报道,李鹏讲的一些话被汉城理解为是希望不久实现两国间的最高级会晤。尽管北京对此又加以否认,但早就提心吊胆的台北已敏感地看到了这一闪烁的信号。

台湾大陆政策的策划者之一马英九曾对记者说:“我们看到了闪烁的信号”。马英九甚至认为,中国和韩国之间“事情似乎已经谈妥了。”

6 月份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全球首脑会议上,李鹏总理和韩国总理郑元植友好握手,这一镜头被西方新闻记者认为是两国即将建交所发出的另一个信号。

事实上,建交后韩国官方透露的消息表明,真正一致同意建交是 4 月份曼谷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两国外长在这里举行了会晤,并一致同意建立大使级正式关系。接着双方立即展开了轮流在汉城和北京之间的秘密会谈,最后一次会谈是 7 月 29 日在北京举行的。

台北的惶惑

接二连三的中韩建交信号,使台北感到很惶惑。

5 月 6 日,台湾“总统特使”蒋彦士带着李登辉的密信率团前往汉城。

5 月 7 日,卢泰愚接见蒋彦士,赠“修交勋章光化章”,台湾驻韩“大使”金树基对这次特使访韩的意义强调说“再次显示在韩国与中共加速关系发展之际,我国以主动外交攻势,在汉城与北京、汉城与台北之间换取了有利于我国的外交空间。”5 月 8 日,台《中央日报》刊登了题为《蒋特使李相玉晤谈达成共识,认为应加强中韩关系》的新闻。5 月 10 日,蒋彦士访韩归来在机场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此行强烈感受到韩方友好与善意,双方都有在原有传统“邦谊”上加强合作的共识。

然而,对于特使访韩,日《产经新闻》却认为旨在探讨断交后如何保持双方关系问题。5 月 8 日,台《联合报》发表了题为《卢泰愚见蒋彦士避谈“外交”关系》的文章。5 月 7 日,台《中国时报》记者采访了韩国外务部次长卢昌熹,有几段问答很有意思:

问:我国政府已表示,南韩寻求与中共建交是南韩政府的事,我们的立场是中韩应维持

现有邦交关系。对此你的看法如何？

答：南韩是希望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同时我们也希望与台湾维护非常好的关系，目前我们正试图找出解决方案，保证各方面都满意。

问：您刚才提到的是希望与“我国”维持“非常好”的关系，而不是外交关系……？

答：我并没有任何特殊的意思，我是指各种关系，并没有将外交关系排除在外。

问：……南韩是否可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同时承认“中华民国”？

答：我国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不过每件事都是可能的。

汉城：真诚的遗憾

台湾和韩国过去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往来。44年的“外交关系”随着断交而结束，互惠的经济往来悬在了半空。

根据中韩建交协定，大韩民国拒绝了台湾提出的允许其驻汉城代表处使用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名称的要求。同时以中国驻韩大使馆是清政府时建立的，其价值2.5亿美元的财产应归中国国民所有为由拒绝了台湾的保留馆产的要求，并将其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此，韩国向台表示了“真诚的遗憾”，8月28日汉城电台发表评论对韩台“断交”感到痛心。评论说韩国为了实现国家统一，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定，不得不做出这样选择，希望能得到台北的理解。

8月24日，卢泰愚总统就韩中建交发表的谈话中说：“政府在同中国协商建交过程中，曾积极努力不损伤我国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并明确表示了在断绝官方关系以后要维护最好的非官方关系。”

韩国的选择是明智的，韩国的遗憾同样也是真诚的。

余波未息

10月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了一条题为《朝报就中国国庆发表社评》的新闻，朝报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对我国国庆表示祝贺。

朝鲜是中韩建交利害攸关的另一个国家，但从所有的新闻媒介介绍来看，平壤对此的反应是比较平静的。

中朝是唇齿相依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有着鲜血凝成的深厚友谊。对中韩建交，平壤的回答是，如果中韩建交能导致有利于朝鲜统一的环境，朝鲜并不加以反对。

中国在同朝国建交的同时，也在努力同韩朝鲜发展更为密切的友好关系。西方新闻媒介说，中国仍然是朝鲜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盟国。

西方报纸透露，在中韩建交过程中，中国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使朝鲜有充分准备。

1991年4月中旬，国家主席杨尚昆为庆祝金日成元帅80寿辰到平壤进行访问。许多西

方外交官认为，此行是中国委托杨尚昆来告知朝鲜，中国将最终承认汉城。

中韩建交，台湾的愤怒不可避免地也要朝向大陆。正像新闻媒介所说的，最直接的输家是台湾，它失去了自己的亚洲唯一的也是最后一个盟友。

一时间，台湾的台独势力乘机喧嚣，除了一些人主张打“北韩牌”“抵制韩货”以外，台一些“立委”还主张台湾应全面检查自己的“外交”和大陆政策，鼓吹应摆脱“一个中国”的“束缚”，改打“一中一台”的牌，也有人主张台湾应寻求双重承认，要紧缩对大陆的政策。

其它一些有关国家也纷纷就此发表评论。俄罗斯对此亦喜亦忧，既乐见朝鲜半岛局势更趋于和平稳定，又担心中韩建交使自己在朝鲜问题上的地位和发言权相对降低，更害怕韩国投资从此加速流向中国，自己更难分得一杯羹。日本一些人深感中韩建交对日本外交的影响，提出要中韩合作为前提，重新调整外交格局。

无论路途多坎坷，无论别人怎么评说，中韩建交无疑将大大促进两国人民的交流和福祉。

第四章

咫尺邻居曲谐生 相逢一笑谱新篇

第一节 忆往昔缕缕情深 看今朝阵阵枪声

尼赫鲁访华，毛泽东极尽地主之谊，50万北京人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直到周恩来和陈毅乘坐的黑色道奇轿车平安地驶进总统府时，尼赫鲁才长舒了一口大气。韦尔娜语音凄颤：“周，这不是招待所，是射击场，你是唯一的靶子。”周恩来在回答自己年轻的秘诀时说：“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方式进行生活的。”喜马拉雅山发出了哀叹，它听见了凄厉的枪声。

忆周总理与中印关系

我自1949年10月进入外交部亚洲司工作后，一直分管南亚地区事务，特别是印度，直到1979年从驻印度使馆调回国，前后整整30年。印度是与我毗邻的大国。新中国成立后，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在50年代，两国关系十分友好，是当时我国对外工作重点国之一。印度是周恩来总理出访的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尼赫鲁总理也是第一位来华访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首脑。虽然从1959年至1962年因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两国关系有过一段曲折，但到70年代关系又得到改善和恢复友好。周恩来总理积极维护中印友好，对印度以团结争取为主，对其某些消极面采取既争取又批评，既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留有余地的政策，正确处理了两国关系，其贡献是巨大和突出的。

○ 指示多做印驻华大使的工作

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度政府很快提出了首任驻华大使的人选，征求我国同意。他就是印度原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K·M·潘尼迦先生。潘尼迦先生是位学者，戴

一副金丝边眼镜，留着山羊胡子，著有《印度简史》等书，对历史上中印文化关系和交流很感兴趣，深得尼赫鲁总理的欣赏。南京解放后他留着不走，印度报刊上有一幅漫画，讽刺他全身涂着红漆站在马路上看解放军打腰鼓进城。我把他的简历和政治态度写了个材料，供部务会议讨论时参考。乔冠华代司长后来告诉我说，总理看了以后认为情况基本清楚，决定同意印方任命。潘尼迦大使上任后，总理指示要多做他的工作。后来外交部根据他的爱好，同意并安排他去敦煌和麦积山等地参观，使他对中国产生了好感，他在促进中印关系上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 明确积极争取印度的政策思想

在积极争取印度等民族主义国家上，周总理在政策思想上一开始就十分明确。1952年4月召开第一次驻外使节会议时，驻印度大使袁仲贤等一些驻外使节认为，印度等东南亚国家（当时把南亚也算在东南亚范围），形式上虽独立了，而实质上还是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总理当即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切合实际的。他说：“这些国家过去虽然是殖民地，而现在政治上已独立了，有自己的国会和政府，由当地资产阶级来统治，怎么还能说它们是殖民地呢？只有由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才是殖民地。东南亚国家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同帝国主义有矛盾，我们要积极争取它们，使它们保持和平中立。”

○ 通过印度传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进行武装干涉，在仁川登陆并加速向北推进，威胁到我国安全。为争取避免出现中国被迫出兵的情况，除政府发表公开声明予以警告外，中国决定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国再一次提出警告。由于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就通过印度传话。10月3日凌晨1点，周总理紧急约见印度大使潘尼迦，由亚洲司副司长陈家康去大使官邸，陪同他直接去中南海西花厅。后来潘尼迦在他的回忆录中诙谐地说，陈家康深夜到他家，他还以为是前来逮捕他的呢。周总理要印度传话的主要内容是“美军如越过‘三八线’，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而其中关键是一个“管”字。这个中文字眼不太好翻译，用词轻了，美方可能不清楚我方的意图，所以总理事先要译员、总理的外事秘书浦寿昌同志斟酌，要译得恰当。浦寿昌同志采用了“INTERVENE”一字，也就是说中国要介入和干预，这样就把我方意图说得很清楚了。总理在谈话中还说：“我们主张和平解决，使朝鲜问题地方化，也就是不使美军的侵略行动扩大成为世界性的事件。”这个谈话内容很快传到美国后，美国方面竟采取无视的态度，美国悍然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

○ 提出举世闻名的五项原则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印度政府令人遗憾地采取了反对和阻挠的态度。中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正申明：“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任何外国的干涉都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力谋同印度保持友好关系，恳切地表示，“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方面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1952年6月14日，周总理向潘尼迦大使指出：“中国同印度在中国西藏地方关系的现存情况，是英国过去侵

略中国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一切,新的印度政府是没有责任的。英国政府与旧中国基于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特权,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因此,新中国与新的印度政府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要通过协商重新建立起来。”经过双方商量,中印谈判终于于1953年12月31日在北京举行。那一天周总理在西花厅接见了中印双方政府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译员是新闻司的陈辉同志。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印方首席代表是第二任驻华大使赖嘉文先生。在这次会见中,周总理提出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新中国成立后就确立了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即就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中印间)任何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印方同意以周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谈判的原则。

1954年元旦之际,总理节日也不休息,亲自向中央写了谈判方案,其中一一列出上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提出谈判要先易后难的方针,这次只谈判业已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谈边界问题,以便使谈判容易达成协议。印度在西藏所沿袭的各种特权应该取消,但鉴于贸易和朝圣的惯例,凡不损及中国主权的,可以适当保留。谈判方案得到中央批准。经过双方四个月会谈的努力,终于于1954年4月29日达成协议,签署了《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及换文。协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

○ 首次访印,掀起中印友好热潮

1954年6月,周总理利用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休会的空隙访问了印度,受到了印方隆重接待和数十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印方招待他看电影,提供了一份100多部影片的名单,请他挑选。他惟独挑了《詹西女皇》这部影片,以表达对这位在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中女英雄的敬意。两国总理在联合声明中共同倡议:“不仅在中印关系中,而且在一般国际关系中,都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共机关报《新世纪》周刊以整个版面刊登了周总理在泰姬陵前,面带笑容、脖子上挂满花环向欢迎群众双手合十致意的巨幅照片。一时印度掀起中印友好的热潮,到处响起“印地—秦妮巴依巴依!”(意为印中人民是兄弟)和“潘查希拉金德巴!”(意为五项原则万岁)的欢呼声。

○ 亲自主持安排尼赫鲁访华事宜

同年10月,尼赫鲁总理来华进行长达12天的正式访问。周总理对这次访问十分重视,亲自作了周密安排。他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凡是同接待工作有关的方方面面人士都请到了,礼堂挤得满满的。讲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周总理详细地谈了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的意义、我们的接待方针和应注意事项。总的精神是要热情友好,同时要实事求是。在访问期间,毛泽东主席同尼赫鲁总理进行了四次谈话,两国总理更是多次会谈。凡是尼赫鲁要见的各方面人士都进行了安排。宋庆龄副委员长单独会见尼赫鲁总理时没有安排译员和记录员,后来宋副委员长亲手用英文写了个谈话纪要送给周总理,这生动地反映了周、宋之间的相互信赖和尊重。来访前,总理点名要乔冠华和陈家康两人起草他在欢迎宴会上的讲话稿,两人在陈的住处逐句口授,由我笔录。讲话稿高度评价了尼赫鲁总理,称他为印

度杰出的政治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1939年8月尼赫鲁曾作为国大党领袖到中国重庆进行过10天友好访问,可惜周恩来当时到延安开会,不在重庆,两人未能见面),这次访问对增进中印领导人相互了解起着良好的作用。

○ 及时消除中印关系上的阴影

1956年11月至12月,周总理应邀第二次访问印度,受到同样隆重热烈的接待和欢迎。但这时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的阴影,已经初露端倪。在火车上,周总理告诉尼赫鲁总理中缅将谈判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并诚恳地说明中国政府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的态度。关于中印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总理说这条界线是非法的,是从来没有被中国政府所承认的。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和照顾到两国的友好,中国军政人员将严格不越过此线,并表示希望以后能找出解决东段边界的适当办法。然而尼赫鲁总理对中印边界却始终采取不容讨论的态度。当时,达赖和班禅也在印度参加由印度副总统主持的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一些逃亡印度的西藏反动分子企图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的噶伦堡组织请愿,留阻达赖,不让他回西藏。12月底,正在访印的周总理及时同尼赫鲁总理进行较长时间的谈话,要尼赫鲁注意这一情况。尼赫鲁总理表示将注意防止发生乱子,如发生,他要采取措施予以禁止。总理立即向达赖转达了他同尼赫鲁的谈话,然后又会见达赖的随行人员,严正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了达赖,也是害了西藏。如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此而停止。但大门是开着的,达赖什么时候回西藏都欢迎。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地位,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总理已经表示印度不能支持西藏搞独立,美国离得太远,要支持西藏搞独立也搞不成。”

经过周总理严肃而耐心的工作,达赖的情绪才稳定下来。他对我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说:这次出来自己没有拿定主意,是一大缺点。许多人要他留在印度不回去,讲了许多西康的混乱情况,自己曾经发生动摇。自从同周恩来总理谈话后,思想稳定了。中央完全信任他,是否回藏由自己作出决定。但此次出访,若在印度出了乱子,印度也负不起责任。达赖还对周总理说:过去藏印间在宗教、文化上联系较密切,而这次来,感到印度方面对他拉的力量很大。另外,据随同达赖出访的一位人士私下告诉周总理,达赖曾向其随行人员传达他同尼赫鲁单独会见的情况,会谈中,尼赫鲁有挑拨和拉拢达赖的话。尼赫鲁对达赖说,西藏同中国政府签订协议后,应该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方面的措施超出了协议(按指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17条协议)的范围,而使西藏方面有困难时,印度政府可以给予帮助等等。由于周总理及时亲自做工作,阻止了达赖背叛祖国、流亡印度的企图,才使中印关系不致因此被蒙上阴影。

○ 认真贯彻对印度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

1959年3月19日夜間,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被我迅速平定。3月31日达赖带着一批人进入印度,并于4月18日在印度阿萨姆邦的提斯浦尔发表鼓吹西藏

独立的所谓“达赖喇嘛声明”。尼赫鲁总理于4月24日亲自去印度北部山区穆索里同达赖会商,并多次发表干涉我内政的声明和讲话。中央对印度采取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毛泽东主席认为尼赫鲁是中间派,不同于右派。他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又有坏的一面。要肯定他好的一面,批评他坏的一面,应该争取他,不要把事情做绝。对达赖也要留有余地,争取他回来。将来他如果想回来,我们还是采取欢迎的态度,但他必须发表声明,放弃西藏独立。周总理根据主席这一精神,亲自抓报刊评论工作,成立了一个国际问题宣传小组。新华社3月19日发表了达赖在离开拉萨前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亲笔信,据此认为达赖是被劫持的(但事隔20年后,达赖在1979年向印度报界声称,他当时写这三封信是出走前为稳住中央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为了顾全中印友好的大局,对印度干涉中国内政,中方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开始时暂不公开点印度当局的名。经周总理审定于4月15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观察家评论——《不能允许中印友好关系受到损害》,只讲了帝国主义和印度非官方攻击我平叛的言论,并对尼赫鲁总理演说中说到“不可让中印关系恶化”,表示了欢迎。4月18日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仍然表示希望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能继续发展,并没有对当时印方极不友好的言行加以谴责。中国只是在印度方面反华言行和面目充分暴露后,才后发制人,在宣传上集中进行反击。5月6日发表了由胡乔木同志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撰写的《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文章全篇贯彻维护中印友好的精神,分析了西藏问题和印方态度的背景,说理充分,用词既尖锐又委婉,注意讲究必要的礼貌,留有余地,尽量争取尼赫鲁同我继续合作。在撰写过程中,周总理还要求,文章在收尾处要引用尼赫鲁1954年10月访华时说过的友好的话。

○ 为缓和中印关系的一番苦心

1959年8月25日,印度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地区挑起第一次武装冲突,接着又在10月21日于西段空喀山口挑起武装冲突。面对这种严重情况,周总理于11月7日致函尼赫鲁总理,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中印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1960年4月,周总理赴新德里同尼赫鲁总理诚恳商谈,但中方的真诚努力没有得到印方的响应。双方除同意由两国官员共同审查、核对和研究有关边界问题的事实材料并向两国总理提出报告外,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双方官员从6月至12月进行了会晤,各自提出了关于中印边界的报告。

为了对中印边界作全面的阐述,根据总理指示,请胡乔木同志执笔,写了1959年12月26日中国外交部给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照会。事先乔木同志要外交部就边界各段提供确切有力的材料。照会就中印边界是否正式划定过、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在哪里、什么是解决中印边界争端的正确途径等三个问题,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做富有说服力的叙述。照会发表后,阿富汗驻华大使向外交部人员表示,他通读了照会后,觉得文字简洁、语气委婉,把复杂的边界问题说得又清楚,又客观,这是他看过的最好文件之一。

从1960年起,印度外交部陆续发表白皮书,题为《印度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交换的照会、备忘录、信件及签订的协定》,前后共出版了11册。每次都发表引发印度议会和报刊的阵

阵反华叫嚣。周总理指示外交部也要编个文件汇编,因汇编封面是红色的,我们内部称之为“红皮书”。当时为便于汇编随时送总理审定,亚洲司在中南海北门国务院借了一间办公室进行编辑。前后共编辑和出版了五册。为了在舆论上不扩大双方分歧和争吵,报上只发表重要的照会、信件。这也是周总理为缓和中印间紧张气氛的一番苦心。

○ 对印度要做到仁至义尽

中印协定于1954年批准生效,有效期为8年,按规定将于1962年6月3日期满失效。早在1961年10月,章文晋司长就对我说,总理要外交部就中印协定将期满问题提出意见。我们提出意见后,总理指示要做到仁至义尽,争取协定不失效,以利于保持中印友好。我们按这一精神,于1961年12月3日、1962年3月1日、5月11日由外交部三次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建议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以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一个新的协定来代替原有的协议。印度方面却无端地把协定同边界问题联系起来,说什么只有中国扭转它过去几年执行的侵略政策,才能进行谈判,再三拒绝了中国的建议。根据事不过三的原则,这个在序言中列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只好到期失效。

○ 始终维护中印友好大局

随着中印边境形势和两国关系的日趋紧张,双方抗议和反抗议、相互指责和辩驳的来往照会大大增加,形成了白热化的“照会战”。我方照会在发出前几乎都由周总理亲自过目和最后审定,注意必要的外交语言。而印方来照却越来越蛮横无理、出言不逊。有一次周总理在接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时说,我们的照会在发出前我基本上都是看过的,我不知道尼赫鲁总理是否也这样做。照会中语气的升级是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希望印方能加以注意。1961年6月,我随章文晋司长陪同从蒙古路过北京回国的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前驻华大使)和印大使帕塔萨拉蒂去上海会见周总理。周总理为恢复中印友好又作了一番努力,但印方后来也没有什么反应。印大使于当年7月20日离任回国,从此印方未再派大使。中方整整等了一年,中国驻印大使潘自力也不得不于1962年7月18日离任回国。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三项建议,要求双方尊重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从这条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两国总理再次会谈。如印度总理不便来京,中国总理愿意前往新德里。但印方在收到中国政府建议的当天,就迫不及待地予以拒绝。接着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宣布全线停火,中国军队从12月1日起后撤,并单方面撤到1959年11月7日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的20公里以外,以脱离接触,这样中印边境的局势才平静下来。1963年2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主动后撤计划,并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军事人员和归还所缴获的武器弹药。12月3日,周总理在出访亚非等14国前夕,还特地接见了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先生,指出:“中印边界的局势是和缓了,除非有一方破坏边界现状,而中国是决不会破坏现状的。中印两国关系不应该再恶化下去。照会战虽然比边境武装冲突好,但双方应该通过照会想办法寻求一些共同点来促进两国关系的改善。”

1967年6月,印度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鲁冠南和一名三秘擅自闯入北京西郊军事基

地,偷拍军事设施,从事间谍活动,被当地值勤人员发现,偷拍的胶卷被当场查获。鲁冠南后来也书面承认他这样做是错误的。中国政府因而宣布这两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印方作为报复,也宣布中国驻印度使馆一等秘书和三等秘书为不受欢迎的人,而且于6月17日纵容暴徒闯入中国使馆院内,焚烧中国国旗,捣毁使馆办公大楼,烧毁两辆汽车,八名中国外交官和工作人员被毒打受伤。消息传来,人们十分气愤。我驻印使馆曾来电报认为印驱逐我一等秘书是不对等的,建议我们也应驱逐印驻华使馆的一秘。周总理在电报上批:此议不妥,不能这样做,如一再升级,有可能导致两国中止外交关系。对北京群众到印驻华使馆门前示威,由于事先作了防范措施,位于东交民巷的印度使馆只是沿街了几扇窗户玻璃被打碎,群众未进入使馆院内,更没有殴打印使馆人员。这在当时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尽管如此,周总理对印驻华使馆被砸事件十分重视,进行了严厉批评。亚洲司的一位违纪干部还受到外交部调离的处分。这是要教育人们认识到,任何违反国际外交惯例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周总理这种以中印友谊大局为重的宽宏胸怀,充分反映了他政治家的风度。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为了调整被“文革”干扰的对外关系,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各国驻华使节。他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拉杰希·米斯拉先生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请问候你们的总统和总理。”印度政府不久即传来口信:“我们准备开始对话,其目的在于清除笼罩着我们两个邻国之间关系的紧张和敌对状态。”当时一度出现中印关系好转的征候,我也被从江西上高外交部“五七”干校调回部内。不料1971年3月发生了东巴基斯坦事件,后又发生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印改善关系的进程因而不得不被推迟了。

○ 愿五项原则永放光芒

1973年1月,总理尿血,膀胱癌复发。早在1972年初,我就发现周总理在接见外宾时,服务员时常进来送药给他服用,说明他当时身体已经不好。1974年起长期住院,已无法过问中印关系问题了,终于在1976年1月8日不幸辞世。总理去世后,有许多印度友人陆续不断前来我驻印度使馆所设灵堂前吊唁,英迪拉·甘地总理也亲自来馆致哀并留言。过后不久,两国即就互派大使达成协议,从此结束了长达14年只有临时代办的局面。今天中印关系已再次恢复友好合作,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关系有很大发展。两国边境也就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宁并采取相互信任措施分别达成了协议。

中印友好来之不易,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记周恩来总理在维护中印友好上所付出的心血和巨大的贡献。在他诞辰1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寄托我对这位伟人的缅怀。愿他老人家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准则能在全世界得到实现,永放光芒!

(李达南:《忆周总理与中印关系》)

缕缕情丝 不尽思念

○ 外交斗争有理、有利、有节

1956年底1957年初,由于当时“波匈事件”的爆发,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的反共浪潮,国际局势骤变。为了做好一些国家的工作和争取一些友好国家的理解,周恩来总理率领包括贺龙副总理在内的代表团,席不暇暖地出访东欧及东南亚等10个国家,其中包括我国近邻印度。

12月和1月,正值我国北方寒冬腊月、滴水成冰之季,但是印度新德里却临秋高气爽、异花奇草嫣然争妍之时。印度人民以传统的豪情深谊热烈欢迎周总理一行的来访。周总理所到之处人群簇拥,花雨缤纷。正当人们沉醉在友谊的馥郁花香之际,印度内部的一股阴暗势力蠢蠢欲动,驱使其当权者向我提出要临时改变正在印度访问的中国西藏地方代表团的访问日程,让达赖喇嘛单独较长期地在印度留访,让班禅喇嘛等其他成员按时回藏。印度此举的目的昭然若揭。对此,正在访印的周总理当仁不让,立即对尼赫鲁指出,两国开展关系要以友好为重,单独让达赖喇嘛留访,在国际舆论上会引起误解,对印不利。尼赫鲁在事实面前也显得理屈词穷,打消了这种非分的要求。为明确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周总理临时决定,让达赖喇嘛在当年玄奘取经和学习的圣地那烂陀,代表中国政府把玄奘一份顶骨赠给印度政府。当时,周总理指出,在这种关键问题上决不能姑息退让,这是原则,讲友好时要想到还有阴暗面,要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作斗争时要考虑还要团结的一面。就这样,周总理又一次通过具体范例,提高了同志们在实际外交工作中辩证法运用的水平。

○ 相互支持 尊重对方

在发展与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国家的关系中,遵循相互支持、尊重对方的原则,也是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中所一贯强调并身体力行的。他平时多次指出支持和尊重的相互作用,只有支持和尊重这些国家,别人方会支持和尊重中国,持之以恒,我们的朋友才能遍天下,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后向朝鲜北部挺进,局势恶化,我国新生政权受到从未有过的严重威胁。10月,北京已摆脱酷暑,气候宜人,但中央领导无暇憩息,频频举行会议以谋决策。在苏联不愿出兵援朝的情况下,中央毅然决定牺牲部分建设的重任派志愿军入朝,但为了作最后一次努力,挽救局势,规劝美国悬崖勒马,拟通过第三国从内部传递这个信息。经全面斟酌衡量后,最后选定了印度。这既尊重了印度的国际地位,也表现了中国对印度的信任。周总理不辞辛苦于10月2日亲自在深夜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潘尼迦来时还睡眠惺忪,心中打鼓,不知周总理这么晚亲自约见为了何事。周总理说,今天请大使阁下下来是有一件重要事情相托。大使先生也知道最近朝鲜形势发展严重,美国军队打着联合国旗号从仁川登陆后向北挺进,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中国政府要

求印度政府向美国转达,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肯定要干预。潘尼迦大使听到这么重要的消息,睡意顿时抛到九霄云外,马上表示要当夜立即报告印度政府。

在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中,我国再次为了尊重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对印度的信任,建议印度担任中立国监察委员会主席,发挥其作用。1954年6月底,周总理在参加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期间,为了同样的目的,暂离气候宜人的日内瓦,鞍马劳顿,拨冗专程访问印度、缅甸,向他们介绍日内瓦会议的进程和听取意见以示重视。周总理在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德里市民举行的欢迎会上明确指出,“对于争取停止印度支那战争,印度一直表现着关怀,并不倦地支持日内瓦会议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很显然,印度的这种立场对于维护亚洲和平有着重大的意义。”“我相信,作为亚洲主要国家的中国和印度,在为和平事业上加强团结,必将使日内瓦会议有更多成功的希望。”周总理的发言使未能参加会议的印度受到莫大尊重,尼赫鲁感到心情非常舒畅。会谈中,我方提出建议把当年4月29日中印两国在北京达成的《中印关系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作为指导两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正式作为处理同其他各国关系的准则,得到印度的同意,即称为“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在对外表态上,周总理特别提醒要作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以表示对印度的尊重。

1954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偕女儿英迪拉·甘地应邀访问中国,周总理决定破例举行从机场到宾馆的群众夹道欢迎。当时有的同志担心规格过高,认为这种礼遇应留给当时“兄弟国家”的元首。周总理指出,对像印度这样的近邻表示尊重并不过分,“兄弟”间的礼节有时倒可不必繁多。就这样,这个行动开创了我国建国以来欢迎外国领导人来访的先例,对尼赫鲁表示了极大的尊重。

1960年,由于历史遗留的原因和两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持不同立场,中印边界问题日趋复杂。4月下旬,为了表示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作最后的努力,周总理不顾新德里已是37℃—38℃的高温酷暑,率领代表团(包括陈毅副总理)访问了印度。会谈中,印方强调执政的国大党内有些元老对如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持不同意见,“不好说服”以致产生困难,周总理当即表示为了边界问题的解决,可以打破礼宾常规,亲自去拜会当时任财政部长的莫拉尔吉·德赛(70年代末英·甘地大选失利下台后,曾领导人民党执政任总理)听取意见,做工作。当时在印各界获得好评,使他们对我国解决边境问题的诚意有了深刻的印象。

○ 精于业务 掌握主动

周总理日理万机、精于业务、孜孜不倦的工作作风是蜚声中外的,在记者招待会上,周总理神态从容、掌握主动的风度更是有口皆碑。平时工作中,周总理谆谆教诲大家要对业务精益求精,基本功要扎实,否则关键时刻过不了关。周总理还经常召见下面具体工作人员听取汇报和询问情况,以掌握第一手材料。周总理的言传身教,使大家受益匪浅。

众所周知,中印边界问题较复杂,但周总理却了如指掌。建国后,总理接见过许多记者,回答过无数问题,但像1960年4月19日至25日访问印度谈判边界问题后,从25日晚10点30分至26日清晨1点,所举行的长达两个半小时的记者招待会,其影响之深、收效之大,